



岷然独立：孙犁纷争

JUERAN DULI: SUNLI FENZHENG

苑英科 著

本书从孙犁一生中的几次纷争入手，通过收集和整理大量的资料和对有关当事人的采访，试图“还原”事实真相。初期抗争：一篇被忽视的文学短论；序的教训：不应把作序者视为乐俑；犁舟之痛：一段难以述说的伤情；续弦风波：爱情阵地上的丢盔卸甲；犁林之伤：隐匿在友情光环中的冷眼；犁坚之怨：芸斋小说的镜花水月；病句纠缠：一场不期而遇的论战；荷派之梦：并没有那么一个流派；封笔之谜：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我终结。

河北大学出版社

崛然独立：孙犁纷争

JUERAN DULI: SUNLI FENZHENG

苑英科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巍然独立：孙犁纷争 / 苑英科著. -- 保定：河北
大学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666-0363-0

I. ①巍… II. ①苑… III. ①孙犁 (1913 ~ 2002)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5319号

责任编辑：梁志林

装帧设计：王占梅

责任印制：靳云飞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开本：1 / 16 (710mm × 1000mm)

字数：230千字

印张：15.25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2014年1月第1次

书号：ISBN 978-7-5666-0363-0

定价：32.00元



序

刘宗武

与苑英科先生相识，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在我交往的研究孙犁和酷爱孙犁作品的年轻朋友中，都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人，换句话说，是最有好感的一人。

获知他的名字，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去年夏天，在白洋淀纪念孙犁逝世10周年的活动时。时间短促，又有许多外地的老朋友相逢，问候叙谈，应接不暇。九年前，我参与建立的孙犁纪念馆，如今已是遍地绿草如茵，垂柳在微风中摇曳。就是在这里，我远远地看见他与朋友们边走边谈，风度翩翩，颇有学者气质。今年四月，在保定—安平参加纪念孙犁诞辰百年的活动，方有了较多的时间与他接触交谈。

在同龄人中，他在很多方面都是有成就的。他在北京的一所大学，担任一个学院的院长，有一定的职位，可是没有一点官架子；在研究方面，已出了几种著作；说起话来，毫无居高临下的态势。他是那样地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所以，虽然我们相识不久，却是一见如故，甚觉相见恨晚。

苑英科是河北高阳人，这个县不大，却是人才辈出。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就知道武生泰斗盖叫天，是高阳人。他那超人的毅力和才气，卓绝的艺术造诣，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顶礼膜拜。还有几位北昆名家，也是高阳人。

高阳县靠近白洋淀边，与孙犁的故乡安平县之间仅隔蠡县，这一带的民俗、民风、民情，都是相近的，对苑英科来讲，阅读孙犁的作品、研究孙犁的作品，占有天然的优势。在他出版了《散兵弦歌：孙犁论稿》之后，又关注了孙犁一生中曾发生过的几件事，如序的教训、病句的纠缠等



等。他认为，这些事件，对孙犁的生活和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很值得研究。我深表赞同。想不到，从安平回津不久，他就把一部厚厚的书稿《巍然独立：孙犁纷争》寄来了，让我做这部书的第一个读者。他还让我读后写点什么。溽暑闷热，心绪不宁，尽力集中精力，把想到的写在下面。文字浅显，卑之无甚高见，却是我真实的感受和体会。

首先，问题选的好。要全面深入地认识一个人、评价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历史人物，必须把他的一生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巨细靡遗，自始至终地进行钩沉、开掘，才可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样，才能比较真实地、可信地掌握研究对象最本质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研究，不论是历史，还是文学，或其它社会科学的研究，无不如此。

鲁迅有一段名言：“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题未定”草》）我认为，这是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必须严格遵循的准则。

孙犁在《题文集珍藏本》一文中说：“我的文学的路，是风雨、饥寒、泥泞、坎坷的路。是漫长的路，是曙光在前、希望的路。”但却“经历了美好的极致”，写出了美好的作品。这基本上是指他在1949年前的生活经历。按说新中国成立了，应该是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殊不知，实际上并非如此。孙犁在一则“书衣文录”中有这样的话：“当变革之期，群众揭竿而起，选士用人，不可拘泥细节。大局已定，则应教养生息，以道德法制教化天下。未闻有当天下太平之时，在上者忽然想入非非，迫使人民退入愚昧疯狂状态，号称革命，自革已成之业，使道德沦丧，法制解体，人欲横流，祸患无穷，如‘文化大革命’所为者。”（见《五种遗规》）孙犁一生中，不顺利、不如意、不开心的事，虽然大都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却无不与“自革已成之业”的岁月息息相关。对孙犁这样一个与世无争、无人无患的本分人而言，这实在是太令人痛心了，也是无比遗憾的。

苑英科的新著《巍然独立：孙犁纷争》，选取了与孙犁有关的九件事情，极尽探赜索隐、钩稽故实之功夫，深思熟虑，撰著成书。从这些事切入，可以说既能揭示孙犁为人处世，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一面，也透析出他思想性格上不足的一面。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真正做到了不为尊者讳，才是对历史负责，对已逝去的或在世的人负责。



古人说：“人不可无癖。”癖，指个性、志趣、嗜好……，孙犁在这些方面都是非常突出的。他的文学成就、美学思想、艺术风格，自不必说。他的个性，自尊、自强、自立、自信，也是非常超群出众的。苑英科通过这九件事，掰开揉碎，条分缕析，把孙犁的外表和内心都探析得透彻、明亮，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面的、真实的孙犁。这是其他研究论述所不及的。

二、材料收集完全。胡适说过，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恐怕依然是文学研究的金科玉律。过去有以观点带史料的研究方法，纯属主题先行，先验论、主观唯心的文学研究。我曾经接待过日本九州大学、国学院大学的教授，他们研究艾青、穆旦、阿垅、孙犁等诗人和作家，从远在数千里之外来到我国，亲自到这些诗人和作家的出生地，以及与生平有关的地方，尽力收集有关材料，到处都看看，不放过点点滴滴的资料。在苑英科的这本书中，每个问题，凡涉及到的人物，他们的生平经历、著作，尤其是前后的种种表现，等等，几乎无所遗漏地收集齐全了。再把这些材料经过细心的甄别、选择，写入文章之中。

作者收集材料之全面、细致，不妨看一看写王林的一篇。孙犁、王林的有关文章、书信、日记，自不必说。此外，尚有冉淮舟的书信、吕正操夫人的话、石坚的文章、段华的回忆、王林之子王端阳的文章、张根生的文章、梁斌的文章、孙晓玲的文章、陈企霞的文章，等等，涉及到十几个人，引用二十余段文字，方方面面都能得到印证，让人无懈可击，无可挑剔。

总之，材料收集的完全丰富、准确可靠，这是研究工作立论的基础，也是一切结论的出发点。

三、论述精审，逻辑性强。《左批评右创作论》，是孙犁的一篇不长的短论，写于1956年，却发表于二十七年后。文章本身一般读者是不难读懂的；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为什么又放了二十多年后才发表出来，这恐怕是绝大多数读者都不甚了了的。然而，苑英科独具慧眼，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能发，把这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的文章，挖掘很深，论证的很精当。作者首先把这篇短论的内容，有重点地概述了一下，并交代了写作发表的过程。之后，引出了孙犁写这篇“火力十足的文章”的缘由。诚如鲁迅所说的，论文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文章从1956年的大气候入手，分析了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的召开情况，引出周扬对孙犁



《风云初记》的批评。由此，围绕《风云初记》的写作、发表、出版，步步紧接，层层深入，一直写到孙犁于1956年3月突然发病。对孙犁的病，所罗列的三种原因，完全是可信的。作者尤其着重地分析了孙犁幼年所患惊风疾，对他一生的影响，这恰恰是被其他评论家所忽略的。孙犁的经历及其精神状况，才使他写出一系列作品，如《铁木前传》、《山地回忆》等。最后，作者回溯了1955年文艺界进行的两场大规模的整肃运动：一是批胡风；一是批丁、陈。而这两场批判，都险些使孙犁滑向深渊，却是给了他巨大的刺激。在作了充分论述后，作者的结论是：“在一生的文学生涯中，孙犁虽然谨小慎微，但是有主见，有意志，不放弃自己的文学立场，不对环境进行妥协，因此才充分显示了自身文学创作的独特性，这才是评价孙犁文学创作的核心要义所在。”的确，在整个二十世纪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像孙犁这样坚守自我，实现自我，善始善终，委实是不多见的。

四、语言质朴无华，清新流畅。在苑英科的论述过程中，没有使用一个引进的新名词、新概念，更没有那种绕来绕去的病句，让读者云山雾罩，晕头转向，不知所以。读他的文章，如同听一位智者娓娓动听地讲述故事，牢牢地吸引了你的注意力，提高你的阅读兴趣，不读下去，不知究竟，绝不罢休。

最后，不论怎么说，苑英科所探讨的有关孙犁的九个问题，大都是敏感的，也是颇有一些争议的，都是研究孙犁绕不过去的问题。我深信，此书面世之日，必将是把孙犁研究引向更加深入、更高层面之时。这对一个学者来说，也是难得的。

二〇一三年八月，伏中于佳闻



目 录	
序	刘宗武 (1)
初期抗争：一篇被忽视的文学短论	(1)
序的教训：不应把作序者视为乐俑	(26)
犁舟之痛：一段难以述说的伤情	(50)
续弦风波：爱情阵地上的丢盔卸甲	(75)
犁林之伤：隐匿在友情光环中的冷眼	(106)
犁坚之怨：芸斋小说的镜花水月	(135)
病句纠缠：一场不期而遇的论战	(157)
荷派之梦：并没有那么一个流派	(182)
封笔之谜：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我终结	(205)
后 记	(231)



初期抗争：一篇被忽视的文学短论

1956年8月13日，孙犁写了一篇文学短论，题目是《左批评右创作论》。这篇文章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它在孙犁文学生涯中的重要意义也一直被掩盖。

《左批评右创作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针对当时文艺批评中的简单粗暴和极左的做法而进行的反击。在文章的开篇，孙犁就明确提出：在对一篇或者一部文艺作品进行评论的时候，不妨采取左批评右创作的方法，就是把批评文章和它所批评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一番独立思考的比较、分析、判断。采用这种方法，对于创作和批评都会是有益的，双方都可以得到提高。接着，孙犁又鲜明地指出：这几年的文艺批评是粗暴的，而粗暴的批评对文艺创作起着阻碍作用。

孙犁说：之所以有些作者认为批评者粗暴，并不是因为作者害怕批评，忽然都变得脆弱，都成了胆小鬼。究其原因，是这种批评本身存在着极大问题：“我们还是不妨引证契诃夫对批评家——这当然指的是不好的批评家的一个看法，他说有些批评家对于作家的工作来说，就像正在耕作的马的肚皮上飞扰的虻蝇。”^①孙犁进一步指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批评界流行着这样一种风气：从创作里摘取一句一段，再加以主观的逻

^① 孙犁：《左批评右创作论》，《孙犁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辑，就给作者定下了这个那个的罪名。”而且这些批评意见，“它常常并不是群众的意见，而是从来也不理解作品的生活实际，只会板‘正确’面孔的个人的武断。”^①

这篇短论最后呼吁，要使“创作和批评站在平等的地位，而免除多年来的批评好像是在审判，创作好像是在受审的感觉。”这样“就可以使读者看到耕地的深浅，看到马匹的勤惰，也可以看到批评是在认真地鞭策，还是在肚皮下嗡嗡！”^②

文末注明，这篇文章写于1956年8月13日。由于这篇文章言辞激烈，写完以后没有立刻发表，文稿存在了冉淮舟处。“文革”结束后，冉淮舟将此稿连同其他稿件一起完璧归赵。1979年1月底，孙犁对这篇文章略加修订，发表于《天津日报》，并在文末写下了一段附记：

此系旧稿，写于一九五六年，未能发表。运动期间，家中文字荡然，此稿因为一青年友人取去，幸未遗失。运动过后，彼知我爱惜羽毛，将此连同其他一些稿件，送还我手，完整无损。深感保存此等物件之不易，现略加订正，表而出之。目前，文艺界之民主及实事求是作风，提倡甚力，已有成效。此文议论，作为历史经验教训观之可也。^③

青年友人自然是指冉淮舟。据冉淮舟证实，发表时最主要的修改是将原稿中“它常常并不是群众的意见，而是来自党委宣传部门”这句话，修改为“它常常并不是群众的意见，而是从来也不理解作品的生活实际，只会板‘正确’面孔的个人的武断。”^④可以说，原稿上这句话锋芒毕露，比文章中的其它那些论断更加震撼人心。这说明，《左批评右创作论》是一篇观点尖锐，矛头直指党的宣传部门的抗争之文，不用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使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篇文章也具有强烈的“危险性”。孙犁之所以发表这篇旧文，为的是让人们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为了减

① 孙犁：《左批评右创作论》，《孙犁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② 孙犁：《左批评右创作论》，《孙犁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192页。

③ 孙犁：《左批评右创作论》，《孙犁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④ 冉淮舟：《孙犁：一九六二》，《百年孙犁》，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0页。



少人们对这篇文章的歧义，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孙犁对这句过激的言辞进行了修改。

孙犁性格内向而敏感，怯于人际交往，一贯谨小慎微，但是为什么写这样一篇火力十足的文章？从主观来讲，一是他创作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受到了周扬的公开批评；二是多年的政治运动已经让他心力交瘁，长期积累的强烈的不满情绪需要宣泄。从客观来讲，“百花时代”的宽松氛围对他创作这篇短论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

周扬公开批评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是在1956年初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

1956年，对于文艺界来讲，是一个“百花时代”。这年的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知识分子经过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斗争和思想改造，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4月，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针对文化和科技问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认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科学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个由知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知识分子迎来了自己的“早春”，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文学艺术界也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

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召开于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参加这次大会的共有66名作协理事和165名作家。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1955年，文艺界整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中国作协又连续召开16次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使得文艺界人士心惊胆颤。因此，这次作协理事扩大会议的召开，带有传达中央精神，激发创作热情，活跃创作氛围的意图。

在这次大会上，周扬作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就是在这一报告中，周扬对《风云初记》提出了批评：

孙犁在他的《风云初记》第一部中生动地描绘了抗日战争的爆发，冀中平原儿女奋起抗敌的真实的图画，但当读者正盼望在第二、第三部看到冀中人民如何英勇地坚持斗争和开辟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时



候，作者却把我们带到离开斗争漩涡的中心而流连在一种多少有些情致缠绵的生活气氛里，这就使第二部中的描写成为软弱无力了。^①

表面看来周扬的批评并不严厉，用词也较为缓和，但是“离开斗争漩涡”则是一种否定的评价，而且是从政治层面上对这部作品的否定。

周扬的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依照当时的文艺批评的标准来对照，势必会得到这种结论。从王端阳整理的《王林日记》中，可以看到王林对《风云初记》有过类似的批评，只不过时间要早得多。1953年5月15日，王林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读完孙犁同志《风云初记》二集。头集头很有气势，愈后愈松。二集可以说是一章一章地凑了。不乏很有诗意的章段。但总的企图和计划是看不出来的。他自己也说写一段想一段的写。

故意违背历史事迹的写法，不知是何用意？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台儿庄大会战，冀中尚出兵配合，孙将拆城破路写在此时，与史实不同，与史实空气不配合。这部著作才写了抗战第一周年，整个企图尚未写出，当不应过早批评。但违反历史真实的写法，在我觉得别扭。

王林的这种批评自然是自己真实的感受，但是作为朋友，这种评论对孙犁的冲击力不会很大。

周扬还是将《风云初记》列入肯定的作品中而加以评说的，但是却给孙犁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周扬当时的身份是中宣部副部长，是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他的评价，可以看作党的评价和最高层次的评价，而不是某个批评家的个人意见。因此这种批评，哪怕是轻微的批评，都足以致一部作品于死地。谁也不说不准这种公开的、组织的批评是到此为止，还是会进一步发酵，成为更加严厉批评的开始。刚刚经历了对胡风 and 丁玲等作家斗争，孙犁自然会十分敏感，内心一定是十分恐惧的。

批评的场合也令人尴尬。孙犁参加了这次大会，他本人亲耳聆听了周扬的批评。虽然没有材料直接证实这一点，但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考证。

^① 《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6月版。第22页。



1986年4月，孙犁写过一篇《谈照相》的文章，其中一段文字，回忆了自己赴京开会，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的情形：

一九五二年吧，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大会。临结束那一天，通知到中南海照相。我虽然不愿在人多的场合照相，但这是不能不去的。记得穿过几个过道，到了一个空场。凳子都摆好了，我照例往后面跑。忽然有人喊：

“理事坐前面！”

我是个理事，只好回到前面坐下，旁边是田间同志。这时，有几位中央首长，已经说笑着来到面前，和一些作家打招呼。我因为谁也不认识，就低头坐在那里。忽然听到鼓起掌来，毛主席穿着黄色大衣，单独出来，却不奔我们这里，一直缓步向前走。走到一定的地方，一转身，正面对我们。人们鼓掌更热烈了。

我也没看清毛主席怎样落座，距离多远。只听田间小声说：

“你怎么一动也不动？”

我那时，真是紧张到了屏息呼吸，不敢仰视的地步。

人们安静下来，能转动的大照相机也摆布好了。天不作美，忽然飘起雪花来，像虽然照了，第二天却未能见报，大概没有照好吧。

一生只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没能弄到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①

黎之在《文坛风云续录》一书中，对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有着完整的记录。当时他在中宣部文艺处任职，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他在书中言明，3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接见了与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纪要》中也明确记载，3月2日（星期五）下午，“毛主席及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接见出席会议的作家并共同摄影。”^②毛泽东接见作协理事会议的代表，这是惟一的一次。虽然孙犁记述的合影时间是1952年，但是考虑到这一事件的惟一性，还是应该判定是孙犁的记忆出现了误差，可能是由于年深日

① 孙犁：《谈照相》，《孙犁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6～87页。

② 《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6月版。第429页。



久，孙犁误记了会议时间。这种失误，在孙犁的著作中并非少见。

其实，对当时的文艺批评，孙犁早就有看法。在《王林日记》中，有两则记述，充分说明了孙犁对当时的文艺批评的态度。第一则日记写于1953年4月30日，王林记述了孙犁对当时一些文艺批评家的看法。孙犁认为，有些批评家，连李逵都够不上，最多是程咬金：

孙犁同志信从北戴河转来很有趣。《人民文学》四期屁股后边附登一批评“批评家”的文章，说中国的批评家像李逵。孙犁同志信上说李逵战斗，虽目标不明，然易于认清后即反省，且其战斗力亦实充沛。孙谓应称之为程咬金式批评：瓦岗寨英雄中，未有如程咬金之无能者，每逢上阵，连砍三斧，三斧不胜，则扭头就跑……然程咬金在瓦岗寨，号称福将，活到八十，一笑面孔，殆亦有其特色。劝我学习鲁迅的“韧”。

另外一则日记写于同年的6月18日，记述的是孙犁的“幸灾乐祸”：

昨夜到孙犁同志处，拿去对《腹地》的辩护一文去叫他看。闲扯起来。他说他看到周扬同志在电影会议上的报告，周扬同志说文艺创作何时能好转，很难估计。孙开玩笑地说：我听到这种说法，难免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的确，过去的领导方法，过去领导上所提倡、所推崇的批评风气，爱憎标准，弄得文艺界这般垂头丧气。真是自食其果，不能不令人有“幸灾乐祸”之感。

孙犁的这种观点和态度，虽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但由于没有涉及到自身安危，所以还能够谈笑自如。当周扬这位文艺界的“大员”把矛头指向他自己的时候，孙犁也不能泰然自若了。对于周扬的批评，他是铭心刻骨的，直到1980年还记挂着这件事，让冉淮舟查找相关的资料。冉淮舟特意跑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旧书，把周扬批评《风云初记》的那段话抄出来给他寄去。

周扬的批评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孙犁中断了《风云初记》的发表。《风云初记》第一集写于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第二集写于1951年3月至1952年3月。这两集，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出了单行本。第三集写于



1953年5月至1954年5月。也就是说，周扬公开批评这部作品的时候，作品已经基本写完，但是尚未完全发表。孙犁只好将未发表的稿子束之高阁，这样第三集只发表了部分章节，而且也没有出版单行本。直到1962年，文艺政策有所调整，在冉淮舟的帮助下，孙犁对第三集重新整理和补写，并集中发表。之后再淮舟又协助孙犁对全书进行了校阅，于1963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风云初记》一、二、三集的合本。这样，孙犁这部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才保持了较为完整的面貌。冉淮舟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从1961年开始，文艺政策有所调整，紧张的政治气氛缓和了一些。万力同志是一位有远见的编辑家，他让我向孙犁同志约稿，新作、旧作同样欢迎，孙犁同志答应将《风云初记》第三集中十六至二十共五节交《新港》发表，这便是《新港》1962年4月号的《山路》和5月号的《河源》。社会反映很好，万力同志决定《新港》连载《风云初记》第三集，重新发表过去已刊发部分。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来人拜访孙犁同志，联系出版《风云初记》第三集单行本及第一、二、三集的合本。

我着手编辑《风云初记》第三集：《天津日报》发表的一至五节，孙犁同志有剪报；未发表的十六至二十节、二十六至三十节，孙犁同志有手稿；《天津日报》以《家乡的土地》为题名发表的六至十节，《人民文学》以《蒋家父女》为题名发表的二十一至二十五节，我从报纸和刊物上抄了下来；《新港》以《离别》为题名发表的十至十五节，我从《新港》编辑部资料柜中找到两本刊物剪了下来。稿子备齐了，我又仔细校阅一遍，送给孙犁同志。他在2月24日晚写给我的信中说：“今日已把《风云》三集之结尾写好，尚觉满意。如此，则此集已大致就绪矣……三十节——结尾，系一诗一大段抒情尾声。”

《新港》从1962年7月号起连载《风云初记》第二集，至11月号结束。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定：他们排出的《风云初记》第三集清样，照《新港》已发稿改校后，我再协助孙犁同志校对。11月初，我去北京颐和园云松巢，协助孙犁同志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核对《风云初记》一、二、三合集，办法是我读他听。仅进行了一两天，因为孙犁同志觉得头有些不适，我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接着校了几天，



把全书校完。

1963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风云初记》第一、二、三集合本；同年6月，出版了第三集单行本。^①

周扬的批评产生的另外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孙犁神经官能症的爆发。

1956年3月的一天中午，午睡起床时，孙犁突发眩晕而跌倒，头碰在书柜上，左脸脸颊被书柜门把手划了一个半寸多长的口子，血流不止，只好到医院缝了五针。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是3月6号结束的。孙犁的晕倒是在当月，回到天津不久。

当时，孙犁正在创作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已经接近尾声，“跌倒”是由于“眩晕”所致。孙犁很清楚，“眩晕”是自己神经系统不大健康的表现。孙犁自幼神经系统患有疾病，得过惊风疾，长期失眠。但是对于这种病症，他没什么知识，也没有足够的重视。报社的同事们不大了解这些内情，也没有把“跌倒”看得多么严重，只是认为他太疲惫了，都劝他外出旅行散散心。

就这样，过了“五一”劳动节，孙犁就动身了。先到济南，再到南京，之后是上海和杭州，一路上马不停蹄，走马观花，不到半个月而返。这样的旅行，十分消耗人的体力和精力，丝毫没有舒散心怀，更没有怡情养病，到了秋天，孙犁终于病倒了。孙犁回忆说：“1956年秋天，我的病显得很重，就像一个突然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精神都没有了，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的很。其实这是长期失眠，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的表现。家里人和同事们，都为我的身体担心，也都觉得我活不长了。”^②

孙犁生病后，组织对他十分关心，先是把他送到北京红十字医院治疗，又转到小汤山疗养院疗养，之后在青岛疗养院待了一年，又转到无锡疗养，整整在外面疗养了三年才回到天津。其间，他的母亲去世都没有告诉他。回到天津后，孙犁的创作基本停止，1962年，为了整理旧作，才拿起笔来，但是这种写作是断断续续的，持续时间也不长，到“文化大革

① 冉淮舟：《孙犁：一九六二》，《百年孙犁》，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4页。

② 孙犁：《红十字医院》，《孙犁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命”就彻底中止了。很多论者认为这是孙犁的避祸之策，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还是脑力不允许他从事繁重的创作活动，孙犁担心“旧病复发”，才果断放下了手中的笔。

二

孙犁之所以患上极度的神经衰弱这种心理疾病，大致有这样三种原因，一是神经系统的病弱；二是长期不良情绪的积累和内心冲突的结果；三是重大挫折的强烈刺激。简而言之，幼年所患惊风疾，极大损害了他的神经系统，土地改革及其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文艺界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整肃，使他的心里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和恐惧之中；周扬公开批评《风云初记》则成为他患病的直接诱因。

孙犁出生不久，患上了惊风疾，也就是抽风的毛病。孙犁回忆说：“生我后，母亲无奶。母亲说，被一怀孕堂婢沾了去。喂我些糊，即把馒头弄碎，然后再煮成粥状。因此，我幼年体弱，且有惊风疾。母亲为我终年烧香还愿，并时常请一邻居老奶奶，为我按摩腹部以助消化。惊风病至十来岁，由叔父骑驴带到伍仁桥，请人针刺手腕（清明日，连三年），乃愈。”^①

惊风疾是一种“脑病”，对大脑神经系统必定形成一定的危害，即便治愈，也会留下一些后遗症。晚年，孙犁在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中，再次涉及了这一话题。郭志刚发现，孙犁的头部，或者下巴，有时不由自主地抖动，便问他是不是从小就这样。在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孙犁对自己的惊风疾及其造成的后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说明：

从小不这样。但是，和那个病根儿有关系。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还是比较贫穷，从小我没有奶吃，很弱，弱了大概就很容易得这种病；另外，乡下不大讲卫生，脐带剪的时候，或者是营养不良，都可

^① 孙犁：《〈善闾室纪年〉摘抄》，《孙犁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